

孟宪刚 著



天地智者

THE WISE OF THE UNIVERSE

解读南开大学百岁教授杨敬年

孟宪刚 著

天地智者

THE WISE OF THE UNIVERSE

解读南开大学百岁教授杨敬年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地智者：解读南开大学百岁教授杨敬年 / 孟宪刚著.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 8

ISBN 978-7-5087-2695-3

I. 天… II. 孟… III. 杨敬年—生平事迹 IV. K825. 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01845号

书 名：天地智者——解读南开大学百岁教授杨敬年

著 者：孟宪刚

责任编辑：冯义龙

出版发行：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32

通联方法：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010）66080300 （010）66083600

（010）66085300 （010）66063678

邮购部：（010）66060275 电 传：（010）66051713

网 址：www.shcbs.com.cn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天津市豪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165mm×235mm 1/16

印 张：12.5

插 页：1

字 数：185 千字

版 次：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3.00 元

天地智者的普世价值

——读孟宪刚新作《天地智者》

(代序)

电脑屏幕上的《天地智者——解读南开大学百岁教授杨敬年》(下称《天地智者》)书稿，是我天津南开中学的同窗好友孟宪刚兄的新作，请我先睹，约写序言。

初闻之，我有些惶恐，似感为难。论友情，我与宪刚深交数十载，情同手足，理应尽力；论内容，宪刚写的是年逾百岁的资深教授，我辈才疏学浅，岂敢妄言品评？

然而，宪刚极其执著，确信我能担承，并言无须我笔下生花，只要我谈真实的感受，发出思考的声音，为他解读“杨敬年现象”添薪。话说至此，再无理由推辞，只好享受“第一读者”的待遇，权当阅读好书，率先开卷有益了。

—

说起宪刚撰写这部书稿，我有幸属于全程知情者。我与他同住京城，不时有电话往还。牛年春节期间，又接他的电话，说他大年初四给恩师杨敬年教授拜年，看到杨老虽逾百岁，依然思想活跃，身健神爽，处于工作状态，为此他颇多感慨，称之为“牛年第一课”，并将记叙感慨的短文发给我阅。

而后，宪刚的感悟愈益深入，他将杨老的业绩概括为“杨敬年现象”，并且有了写作的冲动，即完成受业“牛年第一课”的课后“作业”，用自己的笔解读“杨敬年现象”，为世人提供一个修身、齐

家、治学、建和谐社会的范本，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到南开学子的微薄之力。

对宪刚的这番思考，我至为赞成，并且凭着同窗相知和职业感觉，预感他会成功，就从专业的角度，发了一些议论，目的是促成此事。其后，从全书架构到章节要点，他不时有电话拨来，既是写作思维互动，也让我知悉笔耕进度。

忽一日，宪刚约我见面，说话声调透着喜悦，说是书稿“封顶”，让我带着U盘，要将电子稿拷贝给我。我一翻日历，从1月29日（大年初四）他给杨敬年先生拜年，到5月7日初稿出手，刚好九十九天。如果减去其间出差等工作时间，实际用时更少，这体现了他追求美和效率的一贯风格。

当晚，我开启电脑阅读。原想先读个开头，然后分段从容阅览。岂知翻开就不愿放下，百余页书稿竟然一口气读完，不觉夜已阑珊。读完静思，书稿内容何以抓我，盖因为作者立意高远，传主业绩感人，字里行间蕴涵着一股强烈的思想冲击力，读到动人处还牵动我眼圈发红，让我的心灵不时泛起精神的涟漪。

说老实话，作者动笔之初，我虽纸上谈兵，鼓动有加，但书稿能写成什么样，我也心中无数。因为较之撰写传记，“解读”的难度不言而喻，作者不仅要涉及传主“做什么”，而且要探究传主“怎么做”，让读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而欲达到此等学术境界，没有相当的思想、学养、功力和人格呼应，大概望尘莫及，用句老百姓的话，没有金刚钻，揽不成瓷器活。

令我欣慰的是，作者的瓷器活做成了，因为他有金刚钻。

二

说起杨敬年先生，我并不陌生。虽然我无缘直接受业先生门下，但通过与宪刚的交往，却也屡屡感受先生的教泽与人品。

印象最深的是两年前的暮春，宪刚在准备南开大学1977级经济系学子聚会的致辞稿时，曾邀我为致辞稿润色，给了我瞻仰杨敬年先生风采的机会。记得那次定稿的致辞是这样写的：

今天，将纪念恢复高考入学三十周年和庆贺杨敬年先生百年寿辰作为这次聚会的两主题，是一个互为关联、内涵深邃的精彩创意。遥想当年，我们第一次聚首南开园，人生的帷幕正在徐徐拉开。彼时，“文革”浩劫刚刚逝去，我们或务农，或做工，或在校，或当兵，经历各异，风华正茂，蓄势待发，渴露峥嵘。然而，从弱冠走向而立的人生关键时段，我们面临着书怎样读、路如何行？

庆幸的是，如此重要时刻，我们得遇杨敬年先生。彼时之先生，慈眉善目，湘音南容，于平常处显造诣，似婉约时露豪情。始以丰厚底蕴令学子折服，再以传奇经历赢学子崇敬。尔后，我辈乘风，翱翔西东，先生之嘉言懿行，如同楷模长存心中。三十年来，任世事巨变，随思潮多元，先生仿佛一座学术与人格的山峰，巍然傲立，笑视苍穹。学习和仰慕先生的榜样，弟子有多少感恩之言在内心翻涌！

先生之德，似山高水长，令我辈仰止。先生诞生于旧中国动荡年代，以无限远大前途自许，树中国读书人崇高理想，于光明与黑暗的较量中抉择坚定。昔者，许克祥策动马日事变，先生宁当小学教员，不事官场苟苟蝇营；既而，留学英伦荣膺博士，先生舍弃赴美计划，回到祖国怀抱之中；再后，遭受极不公正待遇，先生赤诚忠贞不贰，古稀之年加入共产党，矢志追求进步与光明；更有，患难伉俪相濡以沫，病榻长伴传为佳话，真善寓美玉洁冰清。

先生之行，如清风明月，蕴人生宝藏。回首先生平生步履，求学治学贯穿始终。先生出身寒门，幼失怙恃，全靠至亲抚养资助，求学奋进报效苍生。先生勤勉好学，沉浸浓郁，主攻经济胸有城府，广涉各科咀华含英。尤为感人者，改革开放之后，先生焕发青春老来奋蹄，率先引进现代发展经济学理论，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翻译新著与时俱进，编写教材符合国情，为奠定中国发展经济学研究和教育之基础，立言立功，滋兰树蕙，大气恢弘。

先生之志，若鲲鹏扶摇，壮弟子宏愿。先生成果本已不菲，耄耋伏枥再展雄风。著述《人性谈》，播科学箴言；重译《国

富论》，撰求索心声；出镜《大国崛起》，侃侃宏论；寄语《期颐述怀》，皎皎高风；欲践平生夙愿，研究政治改革，再为和谐社会添砖瓦；更吐养生妙谈，健身出自精神，唯造人类福祉新文明。先生百岁雄心不已，为人师表至善至中，此时身教胜过言教，犹如指照弟子明灯：戒骄戒躁，毋怠毋荒，远离浮华，我等谨铭。

古时，先贤韩愈有言：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而今，游子回归母校，佳期良辰幸逢，门生入学卅载，恩师荣颐衍庆。正可谓，双喜同贺，一脉相通：传承先生亲授之道业，引领弟子进取之征程，珍惜科学发展之机遇，创建报效祖国之新功。抬望眼，试看今日寰宇，和平发展正浓，更喜神州盛世，和谐响彻域中；让我们，莫负大好年华，毋忘秣马厉兵，待到中华崛起，师生笑贯长虹！

我之所以整段引用2007年的致辞文字，既为概括杨敬年先生的人格和功业，也想说明一个事实，本书作者表现先生的欲望并非自牛年始。再往前的时间点，见诸正式出版物抒写先生的文字，是他于2006年出版的《雅兴小品》文集中的《撼人心灵的杨敬年先生》一文。而他与我谈论对先生的景仰，则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这又应了伟人周恩来的名言：“长期积累，偶然得之”。

我们透过“撼人心灵”这个形容词，不难看出作者对先生非同一般的认知，由此启动了作者欲向世人介绍恩师的心路历程，而“牛年第一课”则促使作者的思考实现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进而形成一次思维的“核聚变”，不仅从单篇撰写升格为集束挥发，而且生成不吐不快、非吐不可的写作冲动。于是，他生命中的又一个“写作周期”降临，接着便是几近百日的埋头笔耕，将思考诉诸文字，把恩师请出书斋，让文明播撒人间。

《天地智者》的成书过程，完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歌德说过：“现实生活应该有表现的权利。诗人由日常现实生活触动起来的思想感情都要求表现，而且也应该得到表现。”（《歌德谈话录》）普列汉诺夫则说：“艺术开始于一个人在自己心里重新唤起他在周围现实的影响下所体验过的感情和思想，并且给予它们以一定的

形象的表现。”（《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

这本新作虽非艺术作品，却遵循了观念形态作品生产的规律。

三

本书作者撰著《天地智者》的人文诉求究竟是什么？

读过书稿，我似乎领悟到其真谛，即着意解读一个大写的“人”，一个历经“天磨”，自强不息，洞悉社会，浸润文化，“天地境界”的智者。

翻阅我们迄今可知的宇宙发展史，人的话题从来是哲人们的关注点。18世纪中叶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过：“一切理性生物中，我们现在认识得最清楚的是人。”（《宇宙发展史概论》）他的研究，打击了当时统治人们头脑的形而上学宇宙观，后来却陷入一种不可知论。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向全世界宣告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之后，马克思在揭示社会发展趋势时更明确指出，未来的新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资本论》）

综观杨敬年先生的百年经历，始终贯穿着对于人生境界的追求。先生出生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末期，他求索于终结旧中国的革命期，也亲历了新中国从探索到成熟的成长期。在每一次社会变革面前，他都经过深度思索，选择光明，摒弃黑暗，走向进步，远离落后，遵循科学，鄙薄愚昧。在两种前途的较量中，他之所以都选择前者，是因为在心灵深处牢牢地植根着美好境界的憧憬。

然而，就像一个人不可避免地要经历成长期一样，一个政党、一个社会，也要经过成长期的探索才能日趋成熟。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包袱极其沉重的国度，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该是何等“路漫漫其修远兮”！（《离骚》）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追求光明的求索者，却被光明与黑暗较量中的阴影侵蚀。

为此，杨敬年先生经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苦难磨砺。可敬的是，

正如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所说：“宁可受苦而保持清醒，宁可忍受痛苦而思维，也胜似不进行思维。”先生在逆境中淡看失去物质利益，却一天也没有停止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注与思考。终究，光明胜利了。于是，人们对赢得光明的求索者充满敬意，钟情于耳闻目睹的“小故事”，他们虽然不乏善意，却忽略了求索者的思维。其实，所有求索者着眼的都不是小我而是大我，他们不情愿让小我的伤痛成为肤浅的泛滥，他们更在意历史长河中的“大故事”，唯有故事大，思维命题大，才能获取时代的大启示和生命的大境界。

本书作者读懂了杨敬年先生这本大书。他通过长达三十年的接触与观察，探寻到先生的生命脉络、心路历程和核心价值，进而，透过“小故事”，发掘“大故事”，再到表现“大故事”，探究天地境界及其形成规律和社会意义，完成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认识和归纳过程。而勃发于此时的表现冲动，也升华为动力性充盈的创作激情。这又如茨威格所说：“每一个思想家，一待时机成熟，他的主要思想便不可避免地要寻找出口”。已故作家王昌定曾有“创作需要才能”的立论，笔者深有同感，但启动才能需要激情，也是创作起步的应有之意。这就好像驾车，才能如同机器运转，激情则像发动时点火。

在创作激情燃烧起来之后，接下来面临着选择创作路径。在当今浮躁世风侵扰的社会环境中，有着太多的非理性“捷径”诱惑。比如写作，本来是很圣洁、吃工夫的苦差事，但在急功近利的运作中，却成就了获利不菲的“生意经”。作者鄙薄这种庸俗世风，秉承南开母校传授给他的公能禀赋，选择了在荆棘丛中辟路前行，即以学者的治学态度书写学者的人生境界，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好像要跟杨敬年先生读一回研究生。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炼狱般劳作之后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天地智者》，其质量绝对与其投入的劳动量成正比。这本书策划立意高，文化含量高，诉求境界高；卷首自然切入，各章条分缕析，卷尾画龙点睛；通过严谨的构思、缜密的分析、流畅的表述，令人信服地诠释了杨敬年先生的人格结构和核心价值，揭示了天地境界智者的生命规律。本书末尾探索的天地境界与和谐社会的关系，具有凝重的思辨性和鲜明的时代性，而全书发散的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文

学、伦理、健康等方面的知识点，凸显了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和严肃文风。

伟人毛泽东说过：“商品这个东西，千百万人，天天看它，用它，但是熟视无睹。只有马克思科学地研究了它，他从商品的实际发展中做了巨大的研究工作，从普遍的存在中找出完全科学的理论来。”（《整顿党的作风》）理论联系实际，笔者想说一个现象：像杨敬年先生这样学富五车、德高望重的智者，远说在全国，近说在南开，为数相当可观。他们是中华文明的成果、中国社会的脊梁、中国历史的“活化石”，他们身上蕴藏着多少“大故事”有待发掘，积淀着多少“大启示”值得深省，人们不能熟视无睹啊！

由此，不能不说到底著《天地智者》的贡献。本书作者没在南开园供职，也未以文化为业，他却自觉承担了一项文化工程，应该说盖源于南开精神。爱国、社会责任感、办事能力，都是南开教育的关键词。作者和瑞琴校友求学南开的经历，本来就饱经南开精神的浸润。而守望中华文明的意愿，让他们与杨敬年先生产生心灵呼应和共鸣，于是他们完全以文化志愿者的身姿来做这件事，这就如同杨敬年先生，没有任何人要求他做什么、怎么做，而他就偏要追求天地境界。用杨老的精神写杨老，这是他们的初衷。

本来是一个生命个体的求索跋涉，却因为其固有的普世价值，在不经意间升华为理念与境界的传承，进而触动了时代的话题，这就是文化的魅力。

四

杨敬年先生是天地境界的智者，更是大写的“南开人”。

先生的百年人生历程，七十三年与南开紧密联系在一起。更有趣的是，先生的出生日1908年11月23日，即农历的十月十七日，其数字竟然与南开校庆日契合，岂不显露冥冥之中的缘分！

多少南开学子的成长史证明，南开教育是培育学生人格的优质苗圃。杨敬年先生的人生历程，固然与他贯穿一生的求索有关，而他景仰的爱国教育家张伯苓，以及他念念不忘的南开师长、南开教育、南开精神、南开校园，都是造就他人格结构的不可或缺的环境要素。

天地智者

THE WISE OF THE UNIVERSE
天地智者——杨敬年与南开教育研究

这就让笔者在品读《天地智者》之余，不由自主地转换了观察与研究杨敬年先生的视角：既然人们高度评价先生成长过程中的南开元素，为何不能将先生视为南开教育的成功个例，进而诱发人们深入研究南开呢？由此，激活了我心中久已思考的名词：“南开学”。

我20世纪60年代求学天津南开中学，在校期间参加过周毓瑛先生指导的学术性社团“校史组”并担任组长，使我对南开校史萌发了最初的兴趣。告别母校后，我的心始终连着南开。1993年秋，为迎接南开中学90周年校庆，孙海麟校友策划拍摄电视专题片《情系南开》，邀我担任撰稿，我进一步感受南开教育的博大精深。在当时举行的文学脚本讨论会上，我发言谈到将来很有可能建立一门“南开学”，但彼时只是提出“南开学”名词，对其内涵尚未有深入构思。

2002年，海麟策划拍摄大型电视纪录片《百年南开》，邀我担任总撰稿。2006年，经海麟、宪刚等校友策划，我受委托牵头南开中学“老三届”《感念南开》文集编纂工作。2007年后，在海麟主持下，我们又陆续编纂或编著出版了《中国奥运先驱张伯苓》、《津门教育家杨坚白》、《杨志行传》等书。经历了以上这些过程，南开精神、南开办学理念、南开教育经验、南开校园文化、南开师生特征等概念连成一体，我愈益感到需要用一个更高层次的概念来涵盖和包容它们。

于是，在时隔十多年之后，“南开学”这个名词重现我的脑际。“南开学”既然称其为“学”，自然要有其理论体系、内涵与外延，这涉及教育学。根据一般的解释，教育是按照一定的目的要求，对受教育者的德育、智育、体育诸方面施以影响的一种有计划的活动；而教育学则是研究教育现象、揭示教育规律的科学，它研究教育的本质、目的、方针、制度，各项教育工作的任务、过程、内容、方法、组织形式、教师、学校的领导与管理等问题。

由此推及“南开学”，“南开学”应该是具有特定内涵的教育学分支学科。其内涵应该是一门研究南开教育历史、理念、内容、途径、方法、成果等现象，揭示以素质教育培养爱国报国、公能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规律的科学。其外延可以有多维构想：从时间上说，研究南开学校创办背景，办学理念，发展脉络；从空间上说，研究南开系列学校（包括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第二南开中学、重庆南开中学、自贡蜀光中学）的素质教育实践；从内容上说，联系南开系

列学校办学实际，研究教育学包含的领域；从种类上说，研究大学、中学的素质教育规律。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南开学”的理论体系和内容框架。

令笔者欣慰的是，酝酿“南开学”创意的还有他人。1950届重庆南开中学校友周振华先生也曾谈过“南开学”。针对有人质疑南开办学经验怎能成为学问的问题，周振华先生说：“真正的学问，就是要从实际中总结出来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又回到实际中去指导实践更好地发展。我们把丰富的南开经验和生动的南开精神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对它给予科学的解释和理论的说明，这怎么不能算是一门学问呢？”（宋璞主编《张伯苓在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年10月）是啊，既然研究《红楼梦》能够称为“红学”，研究莫高窟可以衍生“敦煌学”，那么博大精深、贡献卓著的南开教育为什么不能升华为“南开学”呢？

探索创立“南开学”不是一校之私利，而是天下之大公。现在急需对“南开学”破题。万事开头难。一旦破了题，凭着南开学子的爱国、敬业与智慧，一定能有所突破。当然，理论研究绝非易事，这是一项需要奉献精神和甘于寂寞的苦差事，也是一个系统工程。整体架构如果一时有难度，也可以先从局部切入，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研究“南开学”在行政手段立项之前，最切合实际的起步，是从民间做起，从有兴趣者做起。

相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南开校友的参与，加上专业人士和机构的组织与升华，有可能为构筑“南开学”框架做好奠基性工作，并在日后使之逐渐成熟起来。笔者以为，这既是今天南开校友感念母校的有意义的举措，也是一代南开学子对历史应该作出的交代。

素质教育是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在近年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的主题词之一。在这些闪烁着科学发展观光耀的文献中，都反复强调“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各级各类学校都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全面协调发展，建设学习型社会。

人类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人才成为核心竞争力的核心。实施素质教育，是适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需要，以德育为核心，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的必由之路。既要培养引领各行各业风骚的精

英人才，也要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普通公民。这正是“南开学”应运而生的时代土壤。

今年是南开建校105周年。爱国教育家严修、张伯苓先生的毕生理想就是教育报国，“为酬素志育英才”。虽然现在的历史条件与创办南开学校的时候不同了，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更加清晰。中国需要报国的人才，时代呼唤“南开学”，“南开学”将是实施素质教育、实现科教兴国的利器。

经历了一百多年风雨历程，积累了旧中国、新中国、改革开放等不同历史阶段的办学经验，有着耀眼的办学成果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的南开系列学校，完全有条件、有资格、有能力创立“南开学”了。此时不创，尚待何时？

2009年2月15日，温家宝同志亲临南开大学，深切怀念南开母校学长和前辈用他们的经历和献身的事迹铸成的南开的道路、南开的品格、南开的精神，称赞这是“学校的灵魂”。他说：“我们要坚持走南开的道路，坚持发扬南开的品格，坚持南开的精神。”（原载2009年2月17日《今晚报》）

探索创立“南开学”，是落实胡锦涛同志关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要求的重要课题，与温家宝同志考察南开大学提出的时代要求是一致的，南开老前辈有知，亦当欣慰！

以上所言，可能失之拉杂或肤浅。《天地智者》新作的问世，给了我们谈论这些话题的机会，可谓这本书功德的延伸。

谨此，我们感谢创造奇迹的杨敬年先生，感谢勇挑重担的本书作者，感谢无私奉献的李瑞琴女士和她的夫君黄立明先生。其实，从守望中华文化、交汇人类文明的角度讲，大家都是志愿者。借助《天地智者》传播普世价值，是所有可敬的志愿者的行为宣示。

周鸿飞
2009年5月10日于北京

自序

2009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考察南开大学时，十分怀念南开母校的学长和前辈。他说：“我讲南开的道路、南开的品格、南开的精神，都是发自内心的，因为它是许多学长、我们的前辈，用他们的经历和献身的事迹铸成的，这就是一个学校的灵魂。”“我们要坚持走南开的道路，坚持发扬南开的品格，坚持南开的精神。”

2009年10月是南开建校105周年，温家宝总理的话道出了南开人共同的心声，也是对每一个南开人的殷切希望和重托。作为南开人，我们应该认真地研究、总结南开学长和前辈的“经历和献身的事迹”，以他们为榜样，秉承“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继承南开传统，弘扬南开精神，在新时期为祖国奉献和创新。这是南开人责无旁贷的、光荣的历史责任。

南开大学教授杨敬年先生，从1936年考取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算起，已是73年的南开人了，是迄今健在的最年长的南开人。他说：“我始终以能做南开人度此一生而自豪。”我有幸于20世纪70年代受业于杨敬年先生。杨老一生的“经历和献身的事迹”，一直在感染和激励着我辈南开后学，我很早就萌发过为杨敬年教授写一本传记的念头。2007年5月，99岁的杨敬年教授出版了自传体的《期颐述怀》，我的这一想法也就暂时搁置了。但是，要为杨老写点什么的念头，始终在我的心际萦绕。

2009年春节，我去给101岁的杨老拜年。临去前我盘算：话题尽量轻松，时间不能过长，绝不能让杨老累着。岂料，见到杨老后，他精神饱满，思维敏捷，侃侃而谈，像30多年前为我们讲授外语课那样，重重地给我上了一课。

杨老说他最心仪的哲学家是冯友兰先生，在抗战前即读过他的

《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接着杨老讲了冯先生《新理学》中的四个哲学概念：“理”、“气”、“道体”和“大全”，讲了《新原人》中的人的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讲了儒家、道家和佛教三者的联系和区别，讲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演变过程，讲了人性，讲了中国的传统哲学与和谐社会的关系，等等。临别时，又再三叮嘱我一定要读点哲学，特别是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回家后，我感到很激动，也很惭愧。我激动的是，杨老的话太凝重了，发人深省；我惭愧的是，没有按照杨老的嘱托以学问立身，至今一事无成。于是当晚写下《牛年第一课》短文，发在南开大学1977级经济系同学创办的博客网“马蹄湖”上。

《牛年第一课》在南开校友中引起了共鸣，大家认为，百岁教授杨敬年的一生具有撼人心灵的传奇色彩，他的百年人生和中国的百年沧桑紧紧相连，很值得我们去研究，去解读。虽然有了《期颐述怀》，但那毕竟是杨老的自述，杨老不能也不便为自己作出定位和评述。作为杨老的学生、作为后学，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认识杨老的生活经历和学术成就，应该从中得到什么启发和教益，值得思考。杨老在晚年为什么对人性、对哲学这样感兴趣，哲学、中国传统文化、人性、人的境界、和谐社会，这其中有些什么样的联系和规律，杨老悟出了什么道理，值得研究。如果把杨老的一生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的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又是什么，值得探讨。

带着上述的想法和责任感，我又一次造访了杨老，并表示，我不度德量力，想尝试写一本“解读杨敬年”的书，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杨老说：“我一生走过的道路是不足为训的，因为它很特殊。如果有人愿意总结，那是件好事。至于对其他人有什么借鉴意义，那就由大家去评说吧！”

杨老学贯中西，自幼熟读四书五经，涉猎经史子集，对文史、经商、政法、英语造诣颇深，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儒、道、佛钻研精通，一生经历特殊复杂、阅历丰富，对中西方社会皆有深刻体认，为世人所敬仰。对我来说，解读杨敬年是一件难度颇大的事情，需要补的课太多了。我只好先给自己“充电”：我把杨老平反以后撰写的几乎所有专著、译著和论文，重新学习一遍，做了重点笔记；把《期颐述

怀》和能找到的有关杨老的报道和评论重新阅读；为了理清杨老的人生经历，编制了“杨敬年年谱”；为了亲身感受一下杨老幼年和青少年的生活环境，我和校友李瑞琴到杨老的家乡湖南的汨罗、岳阳、长沙走了一遭，走访了杨老的故居、外祖父家、岳父家、杨家祠堂、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等处；为了弄清《期颐述怀》中涉及的人物之间的关系，编制了一个“杨敬年族谱”。收集和阅读了一些参考书籍，主要是经济思想史和哲学方面的。杨老精通古典诗词曲赋，文章中时常引用，我不得不到处查读引文原文。一路走下来，我以速成的方式，补了《发展经济学》、《西方经济思想史》、《中国哲学史》、《南开校史》等课程，虽然不深不透，水过之处，地皮也算湿了。

《期颐述怀》真实、全面地记录了杨敬年一生，是我写作的主要依据。我要写的既不是传记，也不是纯论文，是对杨老一生的经历、遭遇、言行、思想感情、学术成就的解读，采用了夹叙夹议的写法。我为本书设计的结构是这样的：卷首和卷尾两部分是综合讲述，中间部分是分题讲述。卷首部分粗线条地勾画出杨老的全貌，再现杨老一生的主要画面，使读者对杨敬年有个比较形象、具体的了解；中间分为十个分题，从十个不同的侧面和多种视角对杨老进行分析和解读。内容包括杨老的求学之路、政治沉浮、南开情结、感情世界、诗文陶



本书作者向杨敬年教授汇报写书构想

治、养生之道。此外，使用了四个分题的篇幅，为杨老在学术上作一定位，除了说明杨老是当之无愧的经济学家、教育家、翻译家之外，还专门对《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人性谈》、《国富论》作了介绍和评述。卷尾部分总结、概括全书，分析了杨老由学子到学者、再到智者的发展过程，对“杨敬年现象”作了初步探析。

本书整体上不是按时间顺序撰写的，但有些分题有按时间顺序铺陈的必要，由于要照顾到它们独立成章的完整性，所以在时间、事件、引文上有某些重复，但观察的视角不同，分析的侧重也不一样。附录中附有《杨敬年年谱》、《〈期颐述怀〉中南开师生评析杨敬年文摘》、《杨敬年与作者通信选摘》，以供读者研究杨敬年时参考。书中多次引用《期颐述怀》的内容，为了节省篇幅，不再一一注明；其他引文，一般随引文注明出处。

本书意在抛砖引玉，希望能够引起社会对杨敬年教授的广泛关注，有更多的人来关心杨敬年、研究杨敬年，使“杨敬年现象”得到更多、更深的解读。在构思和写作过程中，我多次与校友、朋友交流、沟通和商讨，吸收了他们许多有见地的观点和建议。如果说本书有些值得肯定之处，实乃集思广益，功在集体。由于本人的知识、见识、认识、能力所限，再加之欲赶在校庆前出书，我自感在文章的缜密、观点的准确、逻辑的完整等方面，尚有许多不足之处。书中可能有诸多不妥和疏漏，甚至是谬误之处，特别是对于杨老的著述妄加评论，我心中很是不安。恳请各位师长、学长，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不吝赐教。

孟宪刚

2009年5月于北京